



南怀瑾先生

【小文当下谈】

生命的安立

□叶小文

知道南怀瑾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大家、国学大师，他的著述涵盖儒释道、融会诸子百家。他能立足时代科学精神，将古老的中国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文化层面，开拓新的学术视野。

但说实话，在这个忙碌的快餐文化流行的年代，我还真没来得及安静地坐下来，认真地读完他的一本书。就像南老所忧虑的，“当年我读四书五经，都是要背的。小朋友们要放学了，心里高兴，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。这样读书，心里会记住，一辈子忘不了。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，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。”哲人其萎，其言犹存，在南老面前，我其实不如当年的“小朋友”啊。

大概由于我长期从事宗教工作，南老托人带话，盼与我一见。

于是，2005年底，我专程去太湖大学堂拜访他。初次见面，却也似曾相识，并无老幼尊卑的分隔，直言不讳，相谈甚欢。

他开门见山就问，你当了十多年宗教局长，对宗教有何心得？

我说，宗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观，基督教讲“永生天堂”，伊斯兰教讲“再生天国”，佛教讲“无生涅槃”，道教讲“长生自然”，都离不开一个“生”字。

他一笑，未置可否。我便心里打鼓，是否班门弄斧、失之浅薄啊？

次年，我收到他的来信。信中说，他立志“以传统书院之传习为基础，配合现代前沿科技研究方法，希望综合同志者之力，发掘固有传统文化之精华，在认知科学、生命科学主流方向上有所贡献，以冀为人类文化之前行，探寻一条正途”。原来，他的思虑与抱负，并不限于宗教的生命观，而是志在“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！

以后我再去看他，就更亲热了。他带我去看他的药房，讲解他亲自配制的大概可以医多种病症的奇妙的药丸；摆一桌家常菜，看着我大吃大嚼；甚至和我嬉笑，开心得像一个孩子。

后来才知道，先生也不是对我偏爱，而是“友天下士，读世间书”，颇具古侠义之风。常是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”，凡来访宾客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地位高低，均留下就餐，凡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，常常席开四五桌。先生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，午、晚两餐各吃一碗红薯稀饭，各色菜肴仅浅尝而已，酒几乎是点滴不沾。

我知他儒释道皆通，“佛为心，道为骨，儒为表，大度看世界；技在手，能在身，思在脑，从容过生活”，便以“儒释道相通之要义何在”为题，向他请教。

他却反问，你考我啊？你怎么看呢？

在这个平易近人、不端架子的大学问家面前，我也就“童言无忌”“抛砖引玉”了。我说：

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。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、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，人心浮动，没有片刻安宁。欲望在吞噬理想，多变在动摇信念，心灵、精神、信仰在被物化、被抛弃。大家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。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，人，靠什么安身立命？

安身立命即“生命的安立”，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，不仅是儒家的追求，也是儒释道的通义。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：热爱生命，追求幸福——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，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；尊重生命，道德约束——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；敬畏生命，终极关切——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。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、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，但也难免刺激，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，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。于是，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，近利远亲、见利忘义、唯利是图、损人利己，甚至“要钱不要命”的道德失范现象，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、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。

“人，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时，才能急着找出诊治心灵的药方。”例如，儒释道都赞成“孝道”。继承和弘扬孝文化之合理内核，有助于找回尊重生命、敬畏生命这两条约定，治疗迷心逐物的现代病。孝的本质之一是“生命的互相尊重”。孝文化所倡导的“善事双亲”、“敬养父母”、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不仅要求我们尊重自己父母的生命，也要尊重、关爱他人的生命，从而扩展为对上孝敬、对下孝慈、对亲友孝悌、对国家孝忠，将“亲其亲、长其长”的家人之孝升华为“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的大爱。孝的本质之二是“敬畏”。人不应敬畏鬼神，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。宗教的原理是敬畏神，孝文化的原理是敬畏人——敬畏父母、敬畏长辈、敬畏祖先，“家有近祖，族有宗祖，慎终追远，直至始祖”。如果说金钱、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，诱使民德“变薄”，那么，“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”。

我讲了这许多，先生都耐心地听着，还不时点头称许。等我说完，他画龙点睛了：

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说好，西方文化的贡献，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，这在表面上来看，可以说是幸福；说坏，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，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，在精神上，是最痛苦的。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。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，人格养成没有了，都是乱的、不成器的，教育只是贩卖知识，这是根本乱源，是苦恼之源。只有科学、科技、哲学、宗教、文艺、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，回归本位，均衡发展，才有希望。

我常回想先生这些透彻精辟之语。我们讨论的“生命的安立”问题，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“精神的安顿”问题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)

【社会话题】

上世纪 80 年代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时候，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这样一件事：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在上世纪 30 年代画过一幅漫画。画面上有一个做泥人的师傅，正在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，旁边摆着已经脱出来的一模一样的泥人。画家把这幅画命名为“教育”。

叶圣陶讲这个故事，是因为当时他看到我们的教育就好像用模子做泥人一样，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事。由此可见，当教育变成做泥

从丰子恺的一幅漫画说起

□智效民

人的时候，它的终极产品只能是不会思考、没心没肺的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你怎样呼喊，他们也不会具有所谓的创新能力。

其实，在教育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。一种是把人当做万物之灵，认为人的天赋、知识和智慧是天生的，教师的作用，只是把这种与生俱来的潜能开发出来。另一种是认为人生来是一张白纸，教育的目的是在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，使其在人才市场上卖个好价钱。这样一来，在教学上就出现了两大派别，一个是启发式，一个是灌输式。启发式用提问、对话等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，灌输式则要通过耳提面命、死记硬背的方式把知识教给学生。二者最大的区别，就在于是否尊重学生的天性，是否能给学生自由。

其实，早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清华大学教授、曾经写文章给校长梅贻琦的潘光旦就指出，教育既不是训练，也不是宣传。为什么不是训练呢？因为在训练中学生是被动的、被迫的，但是在正常的教育中，学生应该是主动的、自由的。为什么不是宣传呢？因为那些迷信宣传的人总以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。

对于现代教育的这种弊病，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都有清醒的认识，他们的对策之一就是倡导通才教育。比如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就告诫自己的学生，学问范围一定要广，这样才能让我们对世界有好的了解，让我们的思想更为开阔，让生活更有情趣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有独到的见解。他说：“现在的大学教育，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，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。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，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的败坏。”他还说：“学校不是一个工厂……大学的目的，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，而在于使他吃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。”面对学生上大学找工作的想法，他告诫大家，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，否则就会变成贪官污吏。前不久，一位名牌大学的教授居然对学生说，如果不能赚到几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。这其实是诱人犯罪。

为了进一步认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区别，我们不妨看看爱因斯坦的精辟论述。他说：“(仅仅)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。通过专业教育，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，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。假如学生对(人的)价值不能有所理解，那么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，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。”

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，为了推行通才教育，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，让有志于数理化的人学点文史知识，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。事实证明，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，比如为杨振宁、李政道的理论提供实验支持的吴健雄女士，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，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 100 分，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影响很大，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(本文作者为人文学者，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)